



云上的日子

周云龙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云上的日子

周云龙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彭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上的日子/周云龙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7-01-015242-4

I. ①云… II. ①周… III. ①文化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4597 号

云上的日子

YUNSHANG DE RIZI

周云龙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

字数:360 千字

ISBN 978-7-01-015242-4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2015 年度福建省教育厅 A 类项目“近代早期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研究”阶段性成果

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阶段性成果

福建师范大学“文体学研究”创新团队建设资助成果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创新团队资助成果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本与批评”创新团队资助成果

序

中文系的本科生，全部从旗山迁回仓山老校区了。当初迁往新校区，舍不得老校区；现在对新校区却又有些留恋了。福州素有“左旗右鼓”之称，鼓，即鼓山；旗，就是旗山，旗山在乌龙江南岸。如果不是太赶时间，上课前早个二十来分钟到达新校区，恰好碰上空山雨后，青山如洗，白云绕舞，“逶迤飞动，如旗之风靡”，此即旗山也！一时神情大为清爽。就人文言之，溪源江水紧贴校园而过，沿溪上溯，有溪源宫。乌龙江岸，有旧侯官市，“庙踞鼃鼃石，神依土木丛”；“日泻帆光澹，江澄塔影寒”，遗迹犹然可寻。明朝林春泽，居旗山北屿，历成、弘、正、嘉、隆、万六朝，正德进士，活了一百又四岁，有集曰《人瑞集》，子嗣后人，多有文名且长寿；瓜瓞连绵，五六百年来，水西林一直聚族而居。

老校区，又称仓山校区。仓山，即藤山，古名瓜藤山，后贩盐者割为私仓，遂称仓山，其名沿用至今。藤山，在闽江南岸，西起上渡，东至中洲，连绵五里，以其地多种瓜，瓜有藤，故名。藤山北岭，旧有天宁寺，南宋李纲谪居于寺之松风堂。明代藤山人周仕阶，嘉靖举人，仰慕李纲为人，自号天宁居士，其诗集名《周天宁先生诗选》。其子之夔，崇祯进士，重修松风堂，入清不仕，有《弃草集》。藤山北望，一水之隔，有晚清林纾的苍霞精舍。藤山南麓，旧时岁杪，郡人载酒来游，人称梅坞。“藤山梅万树，冬尽一齐开”；“十里花为市，千家玉作林”，此明代文人咏藤山梅之诗也。福州开埠之后，梅坞徒存其名，代之而起的是教堂错绣，领事馆比肩而立，“千门万户，抗云蔽日，塔如、厨如、青白缭错而下”。民初，国民政府前主席林森先生曾就读于英华学校，风风雨雨，如今林公馆修缮一新，青砖瓦舍，掩映于高楼之中，也是藤山的一道风景。

予生也晚,不及亲历 20 世纪 50 年代的院校调整,自然也没有见到福建师范学院在藤山山麓挂牌的盛况。青砖学生宿舍,地板嘎吱作响的筒子楼,通往音乐系的小木屋,遗世独立似的教工之家,短道游泳池,已经无处寻觅。毕业几十年的校友回到母校,总是千方百计想在校园中寻找过去的那些记忆,你可以指着两座八层楼高的研究生宿舍对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您住过的青砖楼,还是叫十四、十五号楼,记忆与现实,两者之间还有着些许的联系;但是,当您兴冲冲去寻找短道泳池,路径找不到了,即使有识途的老马领着您去指认,面对建筑群,您只能茫然不知说啥是好。

建筑传统可能有中断,这对一所学校似乎关系不是特别大。况且,老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如老华南建筑群还在,老音乐系建筑群也还在。比起建筑,一所大学、一个院系,文化学术传统的承传要重要得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近期集中推出三套丛书,其中两套分别以两位学科奠基人,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第二任系主任黄寿祺先生、俞元桂先生的斋名——六庵、桂堂命名,用意了然;另一套取名“藤山”,似也有看重文化积淀、学术承传之意。

黄寿祺先生、俞元桂先生的道德文章,其他两套书的序言都有精辟介绍,兹不赘。说起老中文系的旧事,我曾经在《听彭一万讲五十年前事》略有述及,彭先生知道的比我多,体会也比我深刻。我这里要补充的是一件旧事,一件近事。

十五年前,我编光泽高澍然《抑快轩文集》,偶然接触到黄曾樾教授(1898—1966)的生平著述。20 世纪 20 年代,黄先生在福州文儒坊拜石遗老人为师,治诗古文,石遗老人每有讲授,黄先生退而录之,结为《谈艺录》一书出版,30 年代中华书局已经印了 3 版。石遗老人论闽古文家,首推朱仕琇,高澍然次之。朱氏有《梅崖居士文集》传世,而高氏古文尚无刻本。黄先生不忘师训,十多年间,不断搜集高澍然古文 160 多篇。黄先生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1943 年,福建省政府迁至永安,黄先生供职驿政,也到了永安。日机空袭山城,“每遇警报,挟册而行”,就是说,每当空袭,黄先生随身带的就是他搜集到的高氏之文。黄先生又想,万一躲不过空袭,人亡稿毁,挟册而行,并非上策。先生遂于 1944 年将高氏古文编成《抑快轩文集》上下两卷,自费在永安印行,公诸于世。

一件近事,前年,福建文史馆馆长卢美松先生同时馈赠两部文集。一部是包树棠先生的《汀州艺文志》(方志出版社 2010 年版),另一部是郑宝谦先生的《福

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两位先生都曾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或它的前身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两书都有卢馆长作的《序》。

包树棠(1900—1981),福建上杭人。著《汀州艺文志》,六十万字,为研究汀州文化、艺文不可或缺的著作。包先生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国文系代办之集美国学专门学校,建国之后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退休。《汀州艺文志》动手于1925年,完成于1930年,为其少作,除了《自序》一文发表在1930年《厦大周刊》上,全书生前未曾刊布。

郑宝谦(1938—2014),福建福州人。郑先生先就读于厦门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外文系,先后任教于福建农学院、华侨大学,1973年之后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大家知道郑先生曾任教于历史系,然而,据《福建省旧方志综录》作者介绍,先生还曾在中文系任过教,看到这一介绍,让人汗颜,我们对中文系的历史了解实在太少。《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皇皇一百四十万字,其学术价值,金云铭、黄寿祺、熊德基诸前辈言之详矣。《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出版不到四年,郑先生今夏在孤独中溘然长逝,不觉为之唏嘘。

这两件旧事、近事,都和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有关。黄曾樾先生获得国外博士学位之后,仍然不忘师训,一直念叨着他的老师,继续搜集研究高澍然的古文,难能可贵。老师所说的话,不一定都对,学生固然可以另辟蹊径,但是老师有益的教诲,学生可能会受用一辈子,我自己便很有体会。包树棠教授,毕业于“国专”,在强调学历学位的今天,“国专”,算什么层次?其实,身份不一定都那么重要,《汀州艺文志》1930年完成,2010年出版,书稿完成时包先生还是一位年轻学人。时光已经走过了八十年,出版距离先生谢世也已经三十年!一部浮浮躁躁而产生的所谓著作,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吗?郑先生的生活是孤独的,学术也是孤独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的作者介绍,没有职称,似有智者“藏拙”之嫌,其实公开介绍郑先生是副教授,又有何妨?一位副教授,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写出可以传诸于后人的著作,我们这些有幸忝列教授行列的教师,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在学术上更高地要求自己,免得后人指指戳戳吗?

收入本套丛书的作者有:黄黎星、余岱宗、陈卫、吕若涵、郭洪雷、郗文倩、刘海燕、雷文学、周云龙等,年龄都在四十边到五十之间,都具有博士学位、高职称。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我的朋友,当我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时,他们的音容笑貌跃然于

我的眼前。比起刚毕业不久的博士,他们的学术已经成熟,有比较丰富的积累;比起六十边上或更老的“老教师”,他们则更有活力和创造力,思维敏捷,出手快。他们是文学院各学科的中坚,承上启下;文学院的将来,首先靠的也是他们。文学院一下推出三套丛书,可能是出于作者归类的方便。何况,我上文说过,教授的论著,不一定就一定比副教授高明;同样,不是博导的教师,也可能写出比博导好的论著。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我虽然未能全部读完,但可以肯定,大家都非常优秀,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已经做出成绩。随手举一个例子,郗文倩著作中“鱼龙曼戏”一章,即便我能写得出来,恐怕也不会如此精彩。文倩研究的领域我比较熟悉,故举以为例;其他几位的著作,也许更为突出也未可知。我强调遵从师训、学术传承,但也相信,中青年学人,一定会做得比前人、比老师更好,这样,学术才会进步。

本丛书的作者,都已经不是只出过第一本书的“新人”了,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可能是他们的第二本、第三甚至第四本了,长足的进步,说明文学院很有希望。2012年,中国内地出版的新书达40万种之多,2013年44万种,在出版如此繁荣的状况下,一本新书要超凡出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包树棠先生的《汀州艺文志》、郑宝谦先生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都足以传世。本丛书的作者(当然还有我自己)都得严肃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包先生的《汀州艺文志》是在完成八十年之后才得以出版的。比起包先生,我们幸运得多,出本书似乎不是太难,但是,八十年之后,人们是否还能记得我们今天出版的这部书?假如有人读我们这部书,会有什么反映和评价?我想,如果这套丛书有若干种足以传世,还能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较好的评价,那么我的序也就可以附之而不朽了,甚幸!

汉代,藤山草莱未辟,直到晚唐,此地方有民居。如今阡陌扑地,歌吹沸天,已为福州一大奥区。文学院将本丛书名为《藤山述林》,如前所述,取名很有文化意蕴。文学院本科生都从旗山迁回来了,假如本科生不回迁,却把研究生也迁过去,丛书该叫什么名字?如果让我说,那就叫“旗山述林”吧!谁又能保证,文学院不会再有迁往旗山的那一天?其实,旗山也很不错,那里空气好,山青水绿。

陈庆元

公元2014年8月24日于藤山华庐

自序

一

人很少有机会到“云端看厮杀”，那份抽离与冷静，大部分时间都是出自“熙熙攘攘”的假设。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的意义都可能只是一种自我指涉式的暗示。常人即使脱离符号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偶尔的或“非常”的“创痛”瞬间，否则，就会进入齐泽克（借用好莱坞影片对白）所谓的“大荒漠”，而外在于“人”。这个“大荒漠”估计连太阳都照射不到，因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正所谓“世间所有相遇，都不过是久别重逢”，表面上彼此迥异的人们总是会在思想领域的某个边界上联手，大家无时无刻不在共享着“天边一朵云”。

索绪尔说，符号具有任意性，但他很快又为这句话加了一个注解——这丝毫不意味着说话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能指。虽然每个人都偶尔有过在“云端”体验“真实”的机会，但这个机会未必适合思考、写作、交流——思考、写作、交流的前提就是被 / 自我符号化。世故的波洛涅斯曾如此透彻地评价哈姆莱特的精神状态：“我说他疯了，因为假如要说明什么才是真疯，那只有发疯，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是那也不用说了。”（见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三百多年后，波洛涅斯的“继承人”德里达也曾如此质疑过福柯书写疯癫的可能性。说到底，“云上的日子”都是在

“云下”过的,它其实是一种假想的言说姿态和哲学前提。“云上的日子”虽然是假想的,却是必要的;同时,对这种假想前提进行反思更是必要的。

二

在那部略显艰深却又充满启迪的著作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1997) 里,作者敏锐地指出:在看似最为理所当然的地理“常识”背后,往往潜藏着一套隐而不彰的空间秩序,进而形塑人类的空间想象,构建出一种无意识的思维框架;这些常识可称之为“元地理学”,其知识运作不仅发挥着宏观层面的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权力,而且在微观层面调动了人类对自身事务的任何一种全球性关照;这套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空间结构和地理学框架操控着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甚或是博物学等学科的研究。该著的作者在这个基础上有力地解构了指涉地理空间的种种分类体系和元话语,比如国族、大陆、东/西方等“元地理学”概念。这一论述提醒我们,在人文学科诸领域的研究中,司空见惯的分析单位,诸如国族、洲际、方位间的区隔并非天然自足。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巩固它的变体之一“反欧洲中心主义”,依然以种种诡异的方式深植于人文研究诸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性)”可能是一个相对有所教益的理论工具/批评策略,虽然它自身也因无从拥有超越符号秩序的据点而问题多多。那么,什么是“跨文化”,这是个略显荒诞而无法回答的难题。“跨文化”(过于)庞大的外延使其内涵少到几乎为零,除了笨拙的描述之外,没有概念可以“一言洞穿”其“本质”。最清晰的概念常常是最隐蔽的欺瞒。

根据有限的阅读视野和资料查找,“跨文化”最初似乎指代两个不同政治区域间的文化交汇,后来这一观念被用于文学间的互动转换。后殖民研究兴起后,“跨文化”具有了“文化政治”的意味,涉及文化交汇、权力运作和能动表征等核心议题。本书的讨论即从上述议题组织分析框架,试图扰乱既往研究中的自我指涉倾向,即文化(文学)的边界身份与人为的区域划分相一致的“元地理”学预设。该预设致使当下的人文研究充斥着一种极为鲜明却又不被察觉的主体镜像特质。这种情形在比较研究领域似乎尤其明目张胆,常

以不证自明的姿态招摇过市,但又总是享有着不受审查、质询的优厚待遇。

当然,本书的尝试,必定是极度有限的——在这种尝试和既往研究中的自我指涉倾向的上面,一样漂浮着天边的那朵云。认识到限度和前提并非沉默与虚无的源始,恰恰相反,这是言说和意义的开端。否则,就会陷入波洛涅斯所质问、暗讽的“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是那也不用说了”。

三

该书由系列论文构成,涉及的具体议题似乎不甚统一,包括文类秩序与文化权力、性别操演与空间区隔、帝国意识与他者表征、国族话语与学科规训、历史风暴与个体创伤、文艺体制与叙事场域、媒介技术与思想范式等,不一而足。其中解析的文本类型也稍嫌庞杂,文学/媒介文本与文化/社会文本彼此纠葛交错。但是,“跨文化”则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论题。这本小书里面,“跨文化”既是问题意识,也是方法视野,还是研究对象。

本书收入的论文中,《开放的心灵》在观念方法上可能略嫌突兀,也许期许了自我的另一个开端。这其实是一次不怎么成功的尝试。尝试的动机也许和当下的知识关切暗示出来的氛围有关。无疑,它的尝试和写作又是一次话语矩阵的成功驯化。费希特所谓的“学者的使命”可能正是“学者的遭遇”。《开放的心灵》仍然写于“云上的日子”,不过,就自己而言,“开放的心灵”是对以往写作的一次检讨和反驳。“不如重新来过!”一部影片中,某角色如此向恋人反复地信誓旦旦。然而,正如周蕾所言,“重新来过”无非是在既有的基础上重构起点,被它悖谬地强化了,正是那个急于舍弃的过去,它可能只是过去的一个“危险的替补”。如此说来,“开放的心灵”还是一种“云上写作”、自娱自乐的自嘲。然而,“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只有一直在路上,才有接近“纯粹语言”的可能。

四

该书能够得以结集,并收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编的“藤山述林”丛

书出版,是我莫大的荣幸,这全仰仗文学院院长郑家建教授的邀约、提议与督促。该书内容在写作时间上有一定跨度。如今看来,这些产生于思绪纷乱之际的文字,无一不是让自己噬脐莫及的少作。而且,各部分之间难免存在重复、龃龉之处,收入本书时,自己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改动。严格地说,这些小文章还称不上“研究”,充其量只能说是阅读后的练习。于我而言,已经发表过的论文/少作,作为文本,早就流入了无限的意义生产流通线。谁说论文写作中就没有“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除了应付考核与教学工作需要而重新捡起,所谓“作者”早已遁形消声。此次结集出版,等于作者身份的再度瞬间重现。于写作者本人而言,这实在是大可不必。不过,也有一个好处,它同时也可以成为检讨自己以往工作的契机。因此,这里要对郑家建教授的鼓励与奖掖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还要特别感谢汪文顶教授、葛桂录教授长期以来给我的教导和关爱。感谢我供职的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及其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以及《圆桌》全体同仁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与厚爱。

因担任《圆桌》的主编工作,有幸认识了人民出版社的詹素娟女士,她的严谨敬业与温良谦恭令我印象深刻。《云上的日子》这本小书,能够由詹老师负责编辑,荣莫大焉。

书的出版,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自己的书,既是一个影子,亦是一面镜子。它传达的,既是一次自欺,更是一份自期。

周云龙

2015年暮春花雨纷飞中,福州

目 录

CONTENTS

I “纯真年代”？

西方的“中国崛起论”：话语传统与表述脉络 / 3

构建的消逝，或当代华语电影的“纯真年代” / 21

再铭写本真性，或全球图像生产场域中的资本与权力 / 42

II 发明传统

中西戏剧交流的误区与困境：“国剧运动”及其文化民族主义悖论 / 77

东方文艺复兴思潮中的梅兰芳访美演出 / 95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场域的“写意”戏剧观 / 137

III 主体的眼睛

视觉与认同：《太太万岁》的时空转译及其文化政治 / 151

《色，戒》的戏中戏、中年危机与文化记忆 / 192

表演“中国”：美国舞台上的中国戏剧与中国形象 / 204

《木乃伊3》的中国显影及其跨国消费 / 233

娜拉在现代中国：一项知识的考掘 / 241

IV 普适性的建构

普适性的建构:新、旧剧观念论争中的西方知识状况 / 257

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 / 278

赶超“当下”:“十七年”史剧论争的时代命题及历史根源 / 294

V 开放的心灵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 / 309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元地理想象:实践与反思 / 321

开放的心灵: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的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 / 333

I “纯真年代”？

西方的“中国崛起论”：话语传统与表述脉络

一、基本问题与知识立场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在西方世界引发了版本各异的“中国崛起”的故事与想象。特别是从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发表以来，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中国崛起”或“中国模式”都成为了关注中国现实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对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功应对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似乎又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强化着一个“崛起”的中国形象。尽管聚讼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崛起”已经成为近十多年来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并且逐渐成为思考中国当下问题时无法回避的基本参照框架。换句话说，“中国崛起论”重构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语境。不了解西方“中国崛起论”的深层含义，就无法真正理解当下中国文化软实力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在“崛起”的中国形象被不断塑造并强化的同时，西方世界关于中国